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63–271.**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4pcone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从占有到共生：《鲁滨逊漂流记》与《海浪》的海洋叙事和生态话语建构

尉迟凯林（YuChi Kailin） 郭海霞（Guo Haixia）

摘要: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兴起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全球海洋危机愈演愈烈。因此，生态议题/思想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本文以海洋文学为切入点，探讨西方生态话语建构中海洋叙事的演进过程。以《鲁滨逊漂流记》和伍尔夫《海浪》这两部经典的海洋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叙事分析和中西方跨文化比较，探讨西方海洋叙事从占有到共生的逻辑演进。研究发现，贯穿《鲁滨逊漂流记》全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占有逻辑，而共生逻辑则在《海浪》一书中得以体现。对比研究表明，人类对海洋的态度经历了从占有逻辑向共生逻辑的转变，直接反映了西方自然观的演变。本文以后殖民生态批评和蓝色批评为理论框架，分析并揭示海洋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及话语转向，同时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提供文化参照和伦理启示。

关键词:《鲁滨逊漂流记》;《海浪》; 海洋叙事; 后殖民生态批评; 蓝色批评

作者简介：尉迟凯林，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15614938375@163.com。**郭海霞**（通讯作者），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海洋文学与文化。电子邮箱：hxguo@shmtu.edu.cn。

Title: From Possession to Coexistence: Oceanic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Discourse in *Robinson Crusoe* and *The Waves*

Abstract: Amid rapi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cep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intensified. The

Received: 08 May 2026 / Revised: 23 Aug 2026 / Accepted: 21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crisis in global marine ecosystems is particularly severe. Consequently, ecological discourse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study employs marine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oceanic narratives within Western ecological discourse. It analyzes two canonical works, Daniel Defoe's *Robinson Crusoe* and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 using close reading, narrative analysis,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his approach traces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Western oceanic narratives from a logic of appropriation to a logic of symbiosi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obinson Crusoe* embodies an anthropocentric logic of appropriation. In contrast, *The Waves* manifests a logic of symbio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a shift in human attitudes toward the ocean from utilitarian dominance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is shift directly reflects evolving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nature. Grounded 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nd blue criticism, this research analyzes ethical, narrative, and discursive turns in marine fiction. It simultaneously provides cultural references and ethical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oncept.

Keywords： *Robinson Crusoe*; *The Waves*; oceanic narrative;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blue cultural studies

Author Biographies: YuChi Kailin, Postgraduat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15614938375@163.com. **Guo Haixia**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hxguo@shmtu.edu.cn.

一、引言

西方海洋文学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本质上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张进程相伴相生，《鲁滨逊漂流记》便是这一脉络的典型起点。自此，海员、海船乃至海军等意象，均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隐性载体。作品中对海盗、海战与海洋贸易的书写，直接彰显了人类中心主义与海洋占有逻辑。19世纪西方世界秩序延续了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模式，海洋商品化特征愈发凸显。以伦敦水晶宫博览会为例，鲸脂、珍珠母、珊瑚、海绵、海藻等不再仅是自然标本，更是支撑帝国日常生活的物质资源，海洋物产由此成为全球贸易与殖民消费体系的组成部分。

进入 20 世纪现代社会，人类对海洋的观念逐步觉醒，从盲目开发利用转向追求和谐共生。这一观念转向在伍尔夫的《海浪》中得到深刻体现：伍尔夫构筑了具有独立意义的生态空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呈现出独特的生态文学表征。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海洋秩序面临结构性困境。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海洋治理赤字持续扩大、海洋权益争端频发等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路径，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价值思考。

张奕凡指出，“在现有研究中，尤其是西方视角下，生态批评主要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伦理问题”（202）。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到推崇“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向，被质疑可能形成新的“中心论”话语霸权，暗含后殖民主义的伦理倾向。如何在“去中心”与“再中心”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当前研究面临的难题。而近年来学界关注到由生态学、进化论及生态批评等理论衍生发展而来的“蓝色批评”理论，研究视角随之转向解读人与水、文化与自然、生命与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力图构建契合和谐健康“水球”生态的批评话语。

然而，现有研究对人类海洋叙事的话语转变探讨不足，尤其缺少对从“占有”到“共生”之伦理转向的专门考察。鉴于此，本文以《鲁滨逊漂流记》与《海浪》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后殖民生态批评与蓝色批评的理论框架之中，考察西方海洋叙事如何呈现从“占有”到“共生”的伦理转向。同时，通过中西跨文化比较，分析不同语境下海洋文明的书写差异，探寻文学叙事在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伦理建设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鲁滨逊漂流记》：荒岛占有与征服叙事

《鲁滨逊漂流记》叙述了人类早期的荒岛殖民实践与资产阶级秩序的建构过程。康子兴认为：“在笛福笔下，海洋代表某种隐喻，既象征着由海洋连接起来的贸易与秩序（即海洋帝国体系），也象征着驱使无数鲁滨逊们远涉重洋的民情与风俗”（41）。小说中，鲁滨逊执意出海，屡次遭遇风暴、沉船、被海盗俘虏等险境。在一次前往非洲的航行中，他侥幸逃生，随后在巴西雇佣奴隶、经营种植园。这一行为表面上是自给自足，其根本目的却是扩大生产、追逐利润最大化。这种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力剩余价值以积累财富的方式，鲜明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船难流落荒岛后，鲁滨逊搭建住所、种植麦稻、驯养山羊、烧制陶器、烘烤面包等一系列生存实践，集中体现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占有伦理：将自然与他者视作可支配、可利用的对象。正如刘爽和金智贤所指出的：“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是西方海洋文学的代表，构建了以‘征服海洋’‘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海洋话语体系”（100）。这一“征服海洋”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话语逻辑在鲁滨逊的荒岛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他通过持续性的劳动和资源占有，将原本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化为服务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此外，“占有”不仅指将资源据为己有，更强调为我所用。鲁滨逊在荒岛上通过记账、规划生产、管理生活物资等行为，复刻了资产阶级的法律逻辑与社会秩序，将荒岛改造为一个小型资产阶级社会，他本人则成为这一社会的绝对主宰。单纯的盲目占有不足以支撑一个稳定运行的社会，因此占有必须具备理性化特征。小说中，鲁滨逊详细记录粮食储备以保障冬季生存，制定捕鱼与种植计划，将整个自然环境纳入理性管理体系，嵌入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之中。周洁认为：“为了种植麦子和驯养山羊，他那可以长成树的木桩围栅在岛上的开阔地带开始大规地扩张。这是岛上最初的‘圈地运动’”（48）。鲁滨逊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深刻揭示了早期欧洲殖民扩张中“自然”被制度化、工具化的内在机制，同时暗含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肯定。

自然客体化与种族他者化的双重叙事建构，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重要叙事特征。尽管鲁滨逊在荒岛上构建起一个西方现代性的小型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一看似文明的社会内部潜藏着内在的腐

朽性，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奴役与政治层面的压迫。小说中，自然环境被刻画为可供无限开发、随意利用的资源，被鲁滨孙当作纯粹的客体，而非具有独立运行规律与自身价值的生态系统。其典型情节体现在：他砍伐树木建造栅栏、制作家具，将森林当作建材仓库，全然忽视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只关注其对’人类的利用价值；他规划捕鱼时段、制作鱼干，将水域视作“渔场”，无视水体生态与水生生物链。鲁滨孙耗费巨大劳力采伐林木营建防御工事：“所以我差不多费了一整年的工夫，才把我的小小的木栅栏围墙做完。那些木桩都很重，很不容易搬动，我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在树林里把它们砍好削好。至于把它们搬回来，那就更费时间了”（笛福 70）；在渔业获取上，他如此记录：

> 五月四日。今天去钓鱼，但钓上来的鱼没有一条我敢吃的。我感到不耐烦，正想离开的时候，却钓到了一只小海豚。我用绞绳的麻丝做了一根长长的钓鱼线，但我没有鱼钩。不过我还是常能钓到鱼吃。我把钓到的鱼都晒干了再吃。（笛福 73）

自然不仅指向生态系统，也包含动植物在内。孙宏新认为：“从作品中人物对待动物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在鲁滨孙看来，人是绝对的中心，只要威胁到人的安全，人就必须竭尽全力杀死动物，排除对自己的威胁”（161）。小说在归途情节中记录一行人对狼群的大肆捕杀：“于是我们马上冲到那二十多只受伤的狼跟前；它们已跑不动了，只是在地上挣扎。我们拿起刀乱砍乱杀……我们一共打死了六十多只狼”（笛福 190）。动物在此仅仅被视作需要清除的危险，其本身的生命价值遭到彻底漠视。与此同时，小说对星期五的塑造呈现出典型的种族他者化特征。鲁滨逊将星期五看作野蛮人，强行为之取名的行为，象征着荒岛原有主体身份的消解。“首先，我给他起名叫‘星期五’，因为我在星期五那天救了他的命，而我这样叫他，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教他说‘主人’，然后告诉他这是我的称呼”（笛福 154）。星期五被命名的一刻，便成为鲁滨逊的所有物，沦为殖民体系中的奴隶。这一叙事象征着早期欧洲白人在全球范围内随意将有色人种塑造为野蛮、原始、非理性、亟待被教化的“他者”，暗含着深刻的权力隐喻。鲁滨逊将自身的语言、宗教与劳动方式视为唯一正确的文明标尺，贬低星期五的原有文化为野蛮与落后的文化，并通过驯化与教化，使其接受并信奉自己的宗教文化。“从这些事情入手，我逐渐教导他，使他认识真正的神是上帝。我指着天空对他说，万物的伟大创造者就住在天上”（笛福 160）。小说不断强化“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将文化霸权投射到个体与群体关系之中，充分展现了早期西方殖民扩张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与文化治理模式。这种将自然与他者置于支配地位的叙事逻辑与当前海洋文学作家们所倡导的“把人类还原为海洋生态的一部分”，“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树立‘与海共生’的生态意识”截然相反（刘爽、金智贤 100）。海洋文学中的生态书写为重新审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鲁滨逊对森林、水域、动物以及星期五的持续占有与规训，恰恰体现了与“与海共生”相反的主体逻辑，即将人置于自然之上，并通过劳动、制度和文化教化不断扩大自身对自然与他者的控制。因此，小说中的自然客体化与种族他者化并非彼此孤立的现象，而是共同建立在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支配逻辑之上。

此外，作为海洋文学的经典作品，这部小说以陆权中心思维为叙事视角，对海洋展开了工具化

书写。陆权是以大陆为中心，通过控制陆上关键地理区域（如交通枢纽、心脏地带、资源产地等）获取战略优势、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的力量形态，其核心逻辑是对陆地的控制，即对土地、人口与资源的直接占有与整合。小说中鲁滨逊的孤岛生活，便鲜明体现了这一逻辑。鲁滨逊登岛后搭建住所、储备粮食，并对岛屿展开勘探；在确认无他人居住后，他随即宣称对全岛拥有绝对主权，将其视作私人领地。这一带有殖民色彩的行为，体现了典型的陆权“先占即所有”逻辑。鲁滨逊亲自对荒岛进行观察、测绘、命名与分区，将未知荒野纳入欧式空间秩序，完成了对陆地的符号化占有，这正是陆权对空间进行规训的核心手段。此后，鲁滨逊开垦土地、种植稻麦、驯养山羊等一系列行为，将陆地彻底转化为生产资料，直接否定自然的独立价值，完全契合资本增值的陆权逻辑。在这一思维框架下，海洋只是依附于陆地而存在。小说中鲁滨逊虽建造了两只独木舟，却从未进行远航；相比于深耕陆地，他不愿冒险出海。在其视角中，海洋只是陆地的补给线与防御外围，作为延伸资源为陆地服务。因此，潮汐、波浪、海流等自然现象及海洋生物，都被视作可控制、可利用的工具。蓝色批评认为，这种写作模式与思维习惯强化了人类对自然与海洋的支配意识，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生命权利。

总之，“海洋远非单一的冒险叙事舞台，而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文明等级秩序乃至个体身份得以生成、协商与反思的关键空间”（商倩 166）。《鲁滨逊漂流记》以陆权中心主义视角对岛屿与海洋进行理解与书写，揭示了殖民权力运作的内在逻辑，即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同时强化了早期西方海洋观中“以人类为中心”的占有逻辑，也为后续探讨生态共生型海洋叙事文本提供了对照与理论基础。

三、《海浪》：海洋共生与生态伦理呈现

不同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伍尔夫在《海浪》中以意识流手法，传达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伍尔夫巧妙地将“海浪”这一核心意象与六个人物的线性时间叙事相结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互动，使小说结构与自然节律深度契合。在小说中，海洋并非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真正的核心主体。

小说共分九个章节，每章均由描绘海滨从日出到日落景色变化的“引子”，与六个人物交替展开的内心独白两部分构成。例如，小说第一章引子便勾勒出海天交融的黎明景象：“太阳尚未升起。海和天浑然一体，只有海面上微波荡漾，像是有一块布在那里摇摆出层层褶皱”（伍尔夫 1）。天色渐亮之后，“有一只鸟儿在高处啾啾而鸣，一阵儿停歇；然后另一只鸟儿在低处开始啾啁歌唱”（伍尔夫 2）。与此同时，六个孩子从睡梦中醒来，意识朦胧，语言简单跳跃，如同处于尚未分化的自然状态。他们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便已置身于自然之中，这既体现了存在先于意识的哲学观念，也弱化了人类以自身为万物尺度的中心主义思想。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与黑格尔的相关理论形成呼应：黑格尔认为“自我”与“对象”彼此分离，意识需要借助其他主体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在伍尔夫的叙事中，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引子部分不只是衬托人物活动的环境描写，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叙事内容。伴随着太阳的升落、潮汐的更迭，六位人物也历经青春、成长，最终走向衰老与消亡。自然节律与人生历程的深度交融，既使小说结构更为清晰，也暗含着人类与自然遵循着相似的生命

轨迹。伍尔夫以此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借由海浪的节律重新整合并消解了人类中心的叙事逻辑。

《海浪》中人物对身份重构的思考，是小说去人类中心化视角的重要体现。小说中的六个人物都反复表达出冲破个体孤独束缚、与他人和世界深度融合的强烈渴望。赵晶辉等认为：“他们在伍尔夫构建的理想共同体形态中相互依存，灵魂相互慰藉并融合，建立起相互信任、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90）。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人物的主体性呈现出流动性，也使传统意义上封闭、独立的自我边界逐渐消解。步入暮年的伯纳德在最终独白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身份重构：“我不是一个人；我是许多人。我并不能完全分清我究竟是谁——是珍妮，是苏珊，是奈维尔，是罗达，还是路易；也分不清我的生命与他们的生命如何区分”（伍尔夫 250）。伯纳德的自我认知表明，“我”并非能够脱离他者而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融合中形成的复合性存在。由此，小说突破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传统主体观，将人的存在从孤立的个体意识转向与他者及周遭世界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进而呈现出一种超越个体边界的“生态自我”观念。在这种意识之下，人类的界限进一步向外部自然延展，几乎无法把自我和海滩的树木、洒落的阳光截然割裂开来，这种身份矛盾在深层反映了人类自我认同范围的拓展。伯纳德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他希望借助语言确立自身身份，将语言当作稳固的自我边界，而这恰恰成为他与自然相融的根本障碍。但到了晚年，他意识到自己以往对叙事的过度随意性，最终放弃了终结性叙述。这种对语言依赖的觉醒，突破了个体在身份建构中的束缚，是生态伦理观念的有力体现：人类语言无论多么丰富精妙，都具有局限性。伯纳德更趋向于追求一种接近前语言状态的存在，一种能够传递思想与温度、却不足以框定世界的存在。伯纳德最终对语言的自觉放弃，直接揭示了人类无法也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试图掌控自然的道理。

此外，伍尔夫在小说中还传达出反对征服、崇尚循环与互惠的生态理念，具备超前的价值与意义。珀西瓦尔在印度坠马身亡是全书的分水岭，这一死亡方式象征着对当时西方盛行的英雄主义与帝国秩序的质疑与挑战。马可被视为骑士意象的延伸，是征服力量的象征，坠马则意味着征服力量的崩塌。在当时，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珀西瓦尔施展“英雄主义”的舞台，这一情节有力地瓦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威，一切宏大叙事在自然面前都显得虚无而渺小。这正是生态伦理的核心要义：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所谓征服者，或许只是站在随时可能席卷而来的浪花边缘。小说结尾，伯纳德发出对抗死亡、绝不投降的宣言，看似是英雄主义叙事的回归，但紧随其后对海浪拍击海岸声音的描写给出了真正的答案：海浪的声响消解了伯纳德的抗争之声。与此同时，伯纳德的抗争暗含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向死而生”思想：个体只有主动领悟死亡的必然性，才能担负起自身存在的责任，进而突破庸常的日常生活。而伍尔夫的思考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化与拓展——“向死而生”不仅存在于存在论层面，在承认死亡的同时拥抱生命，更是一种生态层面的循环。伍尔夫借助贯穿全书的树与落叶意象隐喻生命：落叶凋零而树木长存，昭示着生态时间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循环往复；正如个体是生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消亡，也会以其他形式回归整体。这种生态智慧与现代海洋观高度契合，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海洋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话语转向

研究发现，《鲁滨逊漂流记》与《海浪》虽同属海洋叙事，却在伦理观念、叙事形式与话语层面呈现出显著差异与转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伦理转向，便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命共生理念。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构建了以殖民权力为核心的话语体系，鲁滨逊对荒岛的私自占有与开发，正体现出对他者的绝对支配及人类中心的宇宙观。作为 17 世纪英国海洋小说的代表作，它也直接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殖民扩张中无视自然规律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对，《海浪》将海洋与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小说中的生态伦理呈现出自然化与情感化的特征，强调尊重、共生与守护。这一伦理转向的核心，在于调整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占有支配走向和谐共生。由此可见，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媒介，既记录了人类对自然伦理认知的变迁，也为现代海洋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与价值参考。

从叙事视角来看，从陆权中心论到海洋本体论的转变，是蓝色批评核心观点的有力体现。《鲁滨逊漂流记》中线性、征服性的叙事结构，强化了陆地作为权力、秩序与安全象征的核心地位，海洋则沦为陆地的附属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笛福的笔下，陆地与海洋均不具备独立的生态系统，二者都只是供人类支配与利用的资源。而在《海浪》中，海洋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小说始终，并构成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不仅作为自然景观反复出现于文本之中，而且通过其不断变化的自然节律与动态特征，与人物的意识活动和生命体验形成密切联系，进而映照个体对自身身份及存在状态的思考。小说进一步将海洋意象提升至本体论层面，以海洋为核心构建出具有独立生命意义的生态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潮汐、光影、波浪等自然节律与人物的生命活动相互交织、彼此呼应，使自然不再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叙事背景，而是具有自身存在价值和内在生命力的存在。由此，小说突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模式，将人的生命体验置于更为广阔的自然关系之中，呈现出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生态观念。

从《鲁滨逊漂流记》的殖民话语体系到《海浪》的生态共生话语体系，这一话语转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其中也暗含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尽管《海浪》力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伍尔夫所构建的理想生态主义乌托邦，依然带有西方知识体系自身的局限。伯纳德厌恶对语言的依赖，试图趋近前语言状态，这一书写在深层揭示出语言作为潜在殖民工具的隐秘内涵。正如鲁滨逊强行给星期五命名、贬低星期五的原有文化，并教化他接受自己的语言与信仰，使星期五原有的文化框架被瓦解，由基督教文明重新塑造，其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也随之被消解。由此可见，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存在演变为新型话语霸权的可能，容易忽视全球南方对于生存权的基本诉求。

在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中，“以谁为本位”这一核心命题具有重要意义，其演变历程复杂而漫长。随着时代发展，海洋文化相较以往已日趋成熟。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被界定为某一区域人类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开发与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化的文化形态，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特定的文化消费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沿海民族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程度不一的海洋文化。

此外，本研究认为，海洋文学中从“占有”到“共生”的伦理转向具有流动性与深度性。这一转向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承载着人类对自然、尤其是对海洋认知的转变，同时也成为衔

接知识世界与生产生活世界的重要媒介，揭示出海洋文化的内在共构性。文学创作以海洋这一动态空间为载体，勾勒并呈现出世界的深度性与生成性，而海洋小说则为这一伦理转向提供了具体而理想的实践场域。

五、结论

本文揭示了西方海洋叙事及其生态话语从“占有”到“共生”的伦理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伴随着叙事视角从陆权中心到海洋本体、话语体系从殖民霸权到生态共生的显著转变。与西方传统不同，在中国古典海洋文学与农耕文明体系中，海洋不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更蕴含着“以海为田、和合共生”的生态伦理。这一传统智慧在隋唐时期已初见雏形：当时的文学作品不再将海洋作为单一叙述对象，转而重点描绘人类涉海活动及其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与《海浪》所展现的海洋主体性有相似之处，但中国文学更强调人与海洋之间的互动，而非平行并置的关系。至宋元与明清时期，海洋被视为与生命相伴的存在，兼具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多重价值，海上贸易与各类生态利用实践便是典型体现。自秦汉起，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便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也随之传播至东亚、南亚等地。这一进程既推动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进步，逐步形成以汉字文化圈为核心的东亚文明格局。中国古代海洋智慧的核心，在于突出共享、和谐与责任意识，这与西方文学所呈现的海洋共生伦理具有内在一致性。

文学叙事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不仅记录着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认知变迁，更在描绘生态伦理的未来图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占有”到“共生”的叙事转向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与流动性的动态过程，深刻展现了人类与海洋关系的复杂性与共构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文本范围，纳入更多元文化语境（如全球南方）的海洋文学作品，开展更深入的跨文化对话与案例研究，以丰富和完善全球海洋伦理理论体系，更有效地应对当代海洋治理与生态危机带来的挑战，为构建真正可持续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伦理启示。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Guo Haixia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0719-7017

YuChi Kail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7127-2115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鲁滨孙飘流记》，徐霞村（笔名方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Xu,Xiacun (Pen Name: Fang Yua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康子兴：<鲁滨逊的贸易与劳动：笛福对海洋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第2期，2022年，第29–59页。

[Kang, Zixing. “Robinson Crusoe’s Trade and Labour: Daniel Defoe’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itime Empire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2, 2022, pp.29–59. DOI: https://doi.org/10.15992/j.cnki.31-1123/c.2022.02.007]

刘爽，金智贤：《从世界对话到本土书写——台湾省海洋文学再观察》，《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1期，2026年，第95–104页。

[Liu, Shuang, and Jin, Zhixian.“From World Dialogue to Local Writing: An Analysis on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26, pp. 95–104.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8]

商倩：《国族想象的文史航图：评张陟<大海如镜：英美海洋小说研究>》，《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1期，2026年，第165–170页。

[Shang, Qian. “A Documentary-Historical Nautical Chart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A Review of Zhang Zhi’s The Mirror of the Sea: A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ea Novels.”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26, pp. 165–170.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15]

孙宏新：《生态批评视域中的<鲁滨孙漂流记>》，《江淮论坛》，第3期，2009年，第160–164页。

[Sun, Hongxin. “*Robinson Cruso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Jianghuai Tribune*, no. 3, 2009, pp. 160–164. DOI: https://doi.org/10.16064/j.cnki.cn34-1003/g0.2009.03.008]

Woolf, Virginia. *The Waves.* Hogarth Press, 1931.

——：《海浪》，曹元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 *The Waves. Translated by* Cao, Yuanyo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张奕凡：《物的主体性与生态伦理——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当代生态文学》，《河北学刊》，第1期，2026年，第202–208页。

[Zhang, Yifan. “The Subjectivity of Things and Ecological Ethics: America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a New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Hebei Academic Journal*, no. 1, 2026, pp. 202–208.]

赵晶辉，裴小维，顾君辉：《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当代外语研究》，第1期，2026年，第83–93页。

[Zhao, Jinghui, Pei, Xiaowei, and Gu，Junhui.“On the Community Writing in 20th Century British Ocean Fic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o. 1, 2026, pp. 83–9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921.2026.01.007]

周洁：《<鲁滨逊历险记>中的“利维坦”隐喻》，《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3年，第47–53页。

[Zhou, Jie. “The metaphor of "Leviathan" in *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no. 6, 2013, pp. 47–53. DOI: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13.06.001]